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2.022

# 从荣誉学位到能力本位：英国都铎王朝时期音乐学位的演进

周亦斌, 易红郡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都铎王朝时期是英国教育转型和大学变迁的关键节点。在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的双重影响下,英国传统大学音乐学位的建设发生了重要转变。从前期将音乐学位作为表彰杰出音乐家和做出重大贡献音乐人才的最高荣誉,到后期变成注重个人实践能力、制定章程规范音乐学位的颁发,其演变不仅体现了英国大学重视音乐教育的优良传统和发展音乐教育的先进理念,亦从侧面反映出英国大学音乐教育演进的趋向。早期英国大学音乐学位的发展为近代大学音乐学位制度的建立、演化和逐步完善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关键词:**英国;都铎王朝;大学变革;音乐学位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2-0178-07

都铎王朝时期(1485—1603),英国恰逢文艺复兴运动的高潮,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使古典文化的复兴、人文精神的传播、宗教教义的博弈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英国教育带着鲜明的人文主义烙印开始了自身的蜕变和转型,不仅体现在教育观念和思想的革新,更浸润在学校教育改革的方方面面。英国都铎时期大学音乐学位的发展,是英国近代大学音乐教育体系构建的初始阶段,凸显出宗教精神和人文关怀对大学音乐教育的深刻影响,奠定了近代英国音乐学位发展的根底。

## 一 音乐学位的中古传承与早期发展

现代大学的学位制度起源于中世纪,学位的头衔及学位庆祝的仪式规范等直接继承了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传统,是中世纪骑士精神在知识和学术领域的延伸。最早的学术学位是12世纪上半叶博洛尼亚大学的法学博士,它极有可能是以查士丁尼大帝给罗马、君士坦丁堡和贝里图斯学院的学生颁发学位的活动为原型<sup>①</sup>。其后迅速传播至萨莱诺大学和巴黎大学,从而促进了医学和神

学学位的产生。中世纪大学课程的统一趋向,促使包含文法、修辞学、逻辑学、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学七门学科在内的“自由七艺”(Seven Liberal Arts)成为进入中世纪大学学习的起点,更是进一步学习神学、法律、医学、哲学四门高级学科的必要步骤。学术学位的候选人必须在学习“七艺”并获得文科硕士后,才有可能获得继续攻读神学、法律、医学学士和博士学位的资格。随着这种学位规范传入英国本土,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先后于1249年和1284年设置学位。英国早期学位的发展主要借鉴了巴黎大学学位设置的基本框架和本国行会的传统。原本从教于大学中的老师,按照中世纪商人和手工艺人的方式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排他性的、类似于学术协会的社团。任何人在没有获得正式执照之前都不允许教书的这项行规,逐渐成为所有类似协会默认的基本守则,也是英国大学学位的最早雏形。可见,早期学位并非个人才华和学术水平的象征,更多的是某种资质的证明,是为行使教学职权而拥有的一纸凭证,

收稿日期:2020-10-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BOA190040)

作者简介:周亦斌(1989—),男,湖南攸县人,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从事英国教育史、钢琴演奏与理论、音乐教育研究。

<sup>①</sup>Hæfer, J. C. F. *Nouvelle Biographie Générale*, Vol. XXVII. Paris: Imprimeurs Libraires de L'institut de France, 1858, p.327.

以合法地保障大学的教育质量和学术声誉<sup>①</sup>。

通过概览博洛尼亚大学收藏的大量英国音乐家的作品可知,英国音乐的发展在同期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不仅音乐在英国公众评价中占有很高的地位,且英国音乐家在欧洲大陆享有崇高声誉,而关于英国大学音乐学位的真正起源却始终没有统一且明确的答案。剑桥大学最早的章程详细说明了获得文法硕士学位的要求,但关于如何获取音乐学位却只字未提<sup>②</sup>。牛津大学1356年的章程也只提及设置艺术、神学、法律和医学四个学院,由于从事音乐研究的人数未达到学院建制的要求,故排除在建院序列之外。同时,因申请音乐学位的人数稀少,学校章程也相应地降低了对音乐学位申请人的要求,以刺激学位申请人数的增长。整体来看,这一时期文科学位引领了英国大学学位的发展,它最初由古典课程中的自由七艺或科学组成,之后细化为“三艺”(Trivium)和“四艺”(Quadrivium)。有证据显示,牛津大学保留这种文科学位发展的模式比剑桥大学持续的时间更长,但在落实过程中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逻辑学和哲学学位脱颖而出<sup>③</sup>。一系列因素导致音乐学位在学位发展的早期,始终扮演着陪跑者的角色。

英国音乐学位承袭了中世纪大学的学位传统,但遗憾的是,深厚的音乐民众基础和音乐家在欧洲的良好声誉,并未让英国音乐学位的发展接续这种先天的本土优势。英国大学音乐学位较长时间内仍处在学位发展的边缘,在摸索中徘徊不前。学位建设不成体系、学位内涵模糊不清是早期音乐学位发展的突出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音乐学科的定位密切相关。音乐是中世纪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音乐研究是否是为了获得音乐学位,其本体价值在大学教育中一直都受到普遍认可,音乐与人类本性的天然联系使其对人格的生成和品质的塑造皆具有极高的教育价值。牛津大学1431年的章程也体现了对音乐学科的价值认同,即文科硕士学位的获取必须在学习与文科学位相关课程的基础上,额外再选修音

乐与算术课程各一年,天文学与几何学则只需学习两个学期<sup>④</sup>。此外,都铎之前音乐学科的学习,主要是以一种包含科学、数学在内的复合方式研究波伊提乌等人的音乐理论,且业界普遍认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够正确区分声音的能力,对声音的精确计算远比耳朵听到的证据更为直接和可靠。因而,音乐研究的重心主要是对音乐中各音间比率的探讨,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音乐在与其他学科结合的过程中,自身的主体地位日趋淡薄、定位日渐模糊,成为其他学科研究的辅助。音乐研究者也常被孤立地称为理论家,其身份标识游离在音乐家或作曲家身份之外,他们以音乐的名义钻研着比例和数学公式,全然忘记了音乐的本质是一门与人相关的实践艺术。直至15世纪中后期,英国大学才逐渐认识到学习音乐不能只是数学公式的推演,应强化对音乐实践的关注。此后,音乐学位的大门逐步向那些真正关心音乐而非音阶数学比率的人敞开。1464年剑桥大学首先向亨利·阿宾顿(Henry Abington)授予了史上第一个音乐博士学位。到15世纪末,牛津大学对音乐研究的热情达到高峰,开始颁发单独的音乐学位,并设置音乐学院作为独立的系部<sup>⑤</sup>。

与早期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授予的文法学位相比,音乐学位在大部分时间里更像是学位发展的附属产物,向少部分人授予音乐学位,也并非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考核或答辩形式进行,甚至有些音乐学位的授予是通过知名音乐家们的投票产生。音乐学位的授予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荣誉表彰的形式,对音乐家的才能给予肯定和鼓励,其本质是为了紧密地巩固音乐家与宗教的联系,从而激励他们更高效地行使音乐的教化与传道职能。

## 二 音乐学位的人文主义演化

都铎王朝的崛起为英国教育的发展开创了相对统一和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随着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兴起,社会流动加剧,等级分化日趋明显。新兴阶层的出现,促进了教育体制

<sup>①</sup>Mullinger, J. B.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Royal Injunctions of 153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73, p.77.

<sup>②</sup>University of Cambridge. *Statuta Academi? Cantabrigiensis*. Cambridge: Typis Academicis Excudebat J. Archdeacon, 1785, p.195.

<sup>③</sup>Jewell, H. M. *Educa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8, pp.19-20.

<sup>④</sup>Anstey, H. *Munimenta Academica, Part I*. London: Longmans, Green, Reader, and Dyer, 1868, p.286.

<sup>⑤</sup>Carpenter, N. C. "The Study of Music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n the Middle Ages (To 1450)",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 1953(01):20.

的形成和教育目标的转变,大学音乐教育的世俗化程度日渐加深,音乐学位的申请者也逐年见涨。这一时期,英国大学的角色完成了从培训神职人员的专门机构到独立自主高等学府的重要转型,为音乐学位的演进减少了约束和阻碍,在价值认知转变和音乐的实践导向中,音乐学位的发展展现出鲜明的人文特色。

### (一) 音乐教育价值的人文转向

自中世纪以来,音乐承担着传播基督教义和行使教化的职能,音乐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教会培养音乐人才,以更好地完成宗教礼拜。人文主义精神在给都铎社会带来巨变的同时,也对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音乐和音乐教育的演化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人们对音乐的认知发生本质变化,开始剥离其宗教属性,音乐的职能从敬神转向育人,音乐教育开始具有更多关涉都铎社会的现实意义和实际功用。在人文主义精神进入英国大学之前,音乐教育研究的重心是中世纪的经典音乐理论,它们普遍讲述的是音乐与数学、天体的关系,探究的是音乐与哲学、科学的结合,此类研究极大地弱化了音乐的本质,模糊了音乐的真正内涵。而人文精神的渗透唤醒了音乐教育对人和人性的重新关注,且关于音乐教育的价值早在人文主义学者和教育家的诸多论述中即得到确证,他们的观点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皆认为音乐教育对人的塑造和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托马斯·霍比爵士翻译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卡斯底格朗的《廷臣论》并指出,音乐教育是培养优秀朝臣的最佳手段,可以作为宫廷塑造理想朝臣的范本。托马斯·埃利奥特爵士(Sir. Thomas Elyot)的《统治者之书》(The Boke named the Governour),强调音乐对于培养统治者的重要性。他认为,培养一名理想的统治者,应该从小就用正确的方式加以规范,不仅各年龄阶段要做恰当的事,且学习也应兼顾适当的愉悦身心的活动,这里主要是指学习音乐。同时,接受音乐教育有利于理解国家阶层的构成,并最终促成阶层间的和谐相处<sup>①</sup>。阿谢姆(Roger Ascham)指出,接受音乐教育是一种追求高尚的行为和成为优雅绅士的途径。理查德·马尔卡斯特(Richard Mulcaster)则将音乐分为声乐和器乐两种,他认为音乐给人带来的愉悦毋庸置疑。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就像一

剂来自天堂的药,可以抚平内心的伤痛,对心灵和身体的抚育大有裨益<sup>②</sup>。此外,都铎时期历任君主及皇室成员深受人文主义学者的影响,成为人文主义精神最早的一批受益者。他们皆深谙音乐之道且造诣颇高,这无疑为大学音乐教育的发展和音乐学位的制度化演进提供了有力的上层保障。

总之,都铎时期的音乐教育在获得人文主义价值观肯定后而出现的转向发展,标志着人们在观念重塑后对音乐和音乐教育内涵的深切体悟,它们不再是宗教象牙塔的专属品,而是愉悦身心、充盈灵魂的宝贵养分。

### (二) 音乐教育活动的实践转型

早期大学中的音乐课程与实践几乎没有关系,主要是数学探索的延伸,音乐教学集中于对音乐理论文本的解读。人文精神在大学的扎根和主体地位的实现,促使音乐教学开始摆脱复杂的拉丁文理论,转向有人参与的表演等音乐实践活动。随着音乐在社会中得到普遍认可,人们关注的重心从音乐是什么向音乐能做什么迁移,这极大地激励了大学音乐教育实践的开展,也间接地影响了社会对具备音乐学位教师的需求和后期申请音乐学位时对候选人实践能力的要求。因而,实用性音乐创作和作曲技法获得极大发展,音乐教学的实践化转型成为这个阶段音乐教育发展的重要特征。

都铎时期著名音乐家托马斯·莫利(Thomas Morley)在其《实践音乐的简易入门》(A Plaine and Easie introduction to Practicall musicke)一书中,还原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音乐教学场景。他从实践层面出发认为,音乐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科,包括音阶的模唱、作曲理论和作曲技法的学习等多项内容,由此音乐的学习需打破以往的文本框架,走向实际运用。加之音乐内涵的变化和民族语言的复兴从根本上激发了多元音乐的创作灵感,虽然在旋律上仍延续单声圣歌的结构,但其表达方式已向情歌、民谣等多种形式拓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亦刺激了音乐学位的实践转化。尽管大学音乐学位在形式上仍保留着中世纪“音乐科学”或“音乐哲学”的思辨色彩,但现实中授予作曲家音乐学位是肯定其在音乐实践中的卓

<sup>①</sup>Elyot, T. *The Boke named the Governour*.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 Co., 1883, pp.28-38.

<sup>②</sup>Mulcaster, M. *Position*.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88, pp.36-37.

越贡献<sup>①</sup>。音乐学位申请开始强调申请者的实践能力,要求必须具备音乐创作和表演能力。据牛津大学章程记载,具有多年校外音乐学习经历的学位候选人理查德·埃德(Richard Ede)若想顺利获得学位,必须在学位授予仪式时创作一首弥撒并现场演唱<sup>②</sup>。

此外,都铎时期宗教音乐的发展并未因人文主义精神的传播而沉寂,在与人文主义结合或者说妥协中,宗教音乐及其表达形式悄然发生改变。随着社会对音乐人才需求的增长,教会音乐教育也开始向世俗化转型,无论是唱诗班的音乐实践还是宗教音乐的教学,都衍生出对人神关系的全新理解。音乐在学习和领会神圣宗教教义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使其成为新教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而不再是以往一味地灌输复杂教义。人文主义精神使宗教音乐成为说服和教育的有力媒介,解读《圣经》时也因此拥有更多的普适意义,它指引着年轻人通过学习《圣经》中浪子回头的故事以克制甜蜜而空虚的快乐<sup>③</sup>。在培养模式上,唱诗班亦转向对其成员个体的关注,如男孩们的年纪是否适合进入唱诗班,其嗓音是否清亮,是否会乐器的演奏等。对人本身的关注和对实用性音乐知识与技能的重视,促使渴望进入大学获得音乐学位的人数逐渐增长,对指导唱诗班学员或教授宗教音乐的牧师和音乐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教师,应该精通演唱声乐作品和演奏乐器,音乐博士和学士应该优先考虑。”<sup>④</sup>

### (三)对音乐学位的逐步认可

16世纪之前,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缺乏相对统一的招生和学位政策,是导致毕业生获得学位人数较少的重要客观原因。然而,从主观上看,对音乐学位普遍的认识不足是造成申请和取得音乐学位人数较少的关键因素。都铎之前人们对获得学位的态度几乎不涉及大学利益,没有获得学位就退学的学生对大学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因此,当时进入大学学习音乐的学生并没有获得学位的强烈渴望,音乐学位对于这部分不需要在学校任教的人来说毫无吸引力,他们更看重的是—种学习经验的积累。大多数人认为,大学教育并不一定要获得学术头衔来证明其内在价值<sup>⑤</sup>。据剑桥大学相关文件记载,国王学院有部分学者在学院常驻的时间从二十多年至五十多年不等,却始终没有获得任何学术上的荣誉及证明。更极端的例子如,学者“罗伯特(或休)·林肯从1382年10月9日住在学院开始,直到1440年12月17日去世时都没有获得学位”<sup>⑥</sup>。

加之,英国在进入都铎王朝之前大学教育整体呈现出的松散状态,使得大学的发展更类似于一种私人企业,除了王室凭借其特权促进大学在受保护的环境中发展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积极、有效的干预。大学音乐教育主要依赖王室、贵族和教会的赞助,它往往不是针对社会各阶层的强制性教育,而是由个人及其监护人来判断它是否对职业生涯有益,如果肯定大学音乐教育的积极影响,再行考虑争取学位资格的问题。虽然王室等精英阶层在受教育之初,音乐已是其课程大纲中的重要科目,且在家庭教师的专门指导下普遍造诣较高,但都铎之前的音乐,不论其内容的表达还是乐曲的结构都受到宗教规则的钳制,赞美上帝是唯一的主旋律。因而宗教音乐家、世俗音乐家以及家庭教师等只能严格遵循规则,谨小慎微地开展音乐活动,甚至在大学部分学院的章程中都有明确规定,禁止在不合时宜的时候演奏乐器和唱歌,因为这些娱乐活动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另外,获得包括音乐在内的各科学位并不会成为王室等贵族阶层获得更广泛社会认可的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地位和影响力亦不需要学位加以证明。“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据显示,这一时期入读大学的学生可能有超过一半没有获得学位或者说从来没有想获得学位的意愿。”<sup>⑦</sup>

<sup>①</sup>Jian Guo and Yi Lyu. “The Origin of the Music Degree System in British Univers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Education Research*, 2019(02):99.

<sup>②</sup>Gibson, S. *Statuta Antiqua Universitatis Oxoniensis*.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31, p.xciii.

<sup>③</sup>Willis, J. “‘By These Means the Sacred Discourses Sink More Deeply into the Minds of Men’: Music and Education in Elizabethan England”, *History*, 2009(94):301.

<sup>④</sup>Leach, A. F. *Educational Charters and Docum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1, pp.502-505.

<sup>⑤</sup>Cobban, A. B. *English University Life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UCL Press, 1999, p.24.

<sup>⑥</sup>Cobban, A. B. *The King’s Hall withi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56.

<sup>⑦</sup>Aston, T. H and Duncan, G. D and Evans, T. A. R. “The medieval alumni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ast and Present*, 1980(86):27.

得益于文艺复兴思想和人文主义精神在英国的传播,对音乐教育和音乐学位的认可在都铎时期开始有所改善,人文精神在解放人性的同时也扩充了音乐的内涵及其表达形式。世俗情感的迸发刺激了音乐的多元发展,对音乐教育实践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而都铎社会对音乐人才的需求开始大幅增长。对音乐学位的认可首先体现在一批长期在校园之外从事音乐活动的作曲家、器乐家群体中。音乐题材的全方位解禁,不仅让这批音乐从业者能够完全地施展才能,通过音乐传递自身情感和主观诉求,极大地促进了表达现实生活 and 情感经验的世俗音乐的传播,而且使这类音乐人群体对自身职业发展有了更高的期许和更长远的规划。加之16世纪大学音乐学位的申请强调音乐研究中的二分法,重视复调作曲的能力和理论学习的时长,经年累月的音乐实践无疑成为这部分音乐人才顺利获得音乐学位的先天优势<sup>①</sup>。因此,进入大学获得音乐学位成为他们自我肯定和获得地位的首选。据不完全统计,进入都铎王朝以后,基本每年都有学生顺利获得音乐学位,而且自王朝中期以后获得音乐学位的人数逐年递增,至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达到峰值。

### 三 音乐学位规范的形成

都铎之前,英国音乐学位的颁发主要是作为教师教学的许可证,附带着一种荣誉的象征和个人杰出能力的证明,因而并无多少颁发程序上的规范化操作。自15世纪开始,对学位候选人包括音乐在内各门科目学时的要求被囊括在内。根据牛津大学15世纪早期的章程记载,学位候选人必须学习一个学期的文法、三个学期的修辞学、三个学期的逻辑学、一个学期的算术和音乐、两个学期的几何和天文、三个学期的自然哲学<sup>②</sup>。关于申请音乐学位的具体要求并无详细记载。至都铎初期,人文精神的传播促使音乐教育更多地关注人人在此岸世界的意义,音乐学位倏而成为寻求自身价值的重要确证。与之前相比,经过具体考

量后被授予学位,成为音乐学位的发展趋势,只有极少部分人因其杰出的音乐能力被授予学位。这一时期著名的声乐与器乐作曲家亨利·帕克(Henry Parker)便是其中一位,他于1504年左右被授予学士学位,但没有证据显示其学位授予时有任何要求<sup>③</sup>。

英国音乐学位的制度化并非一蹴而就,其规范在平稳过渡中逐步成型。自1506—1507学年起,牛津大学开始制定音乐学位的章程,对申请者提出作曲和现场演唱的要求。1516年,剑桥大学对获得音乐学位的实践能力提出具体规定,学位申请者不能仅是音乐理论家,要求必须提交原创音乐作品,包括弥撒、赞美诗或颂歌等多种体裁,并在一些重要的典礼上表演。同时期牛津大学的学位要求大致相仿<sup>④</sup>。牛津大学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博士是莫德琳学院(Magdalen College)的管风琴师罗伯特·佩罗特(Robert Perrot),他在申请学位之时,被学位委员会要求创作一首弥撒和一首歌曲<sup>⑤</sup>。至1518年,牛津大学音乐学位的规定新增创作多声部音乐作品的要求。约翰·查德(John Charde)作为一个有16年音乐学习经历且有自己弥撒和圣歌作品的创作者,在申请音乐学士学位时仍被要求将已有作品交于学监,同时按指定的《垂怜经》再创作一首由五部分构成的弥撒作品<sup>⑥</sup>。

长期以来,深耕于大学中的君教权力博弈,随着英国国教的建立而落下帷幕,大学与罗马教廷复杂的关系终于明朗,其自身亦开始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音乐学位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实践能力开始成为申请音乐学位的基本条件。都铎中期时,大学音乐学位在原有的框架上,提出了更为明确和具体的能力要求且日趋细化,申请难度逐年提升。约翰·格温尼斯(John Gwyneth)这位出生贫苦、受神职人员慈善资助的世俗牧师,在申请博士学位前已从事12年的音乐研究和教育实践工作,同时出版了大量的世俗弥撒作品,以其资质获得学位本该顺理成章,但最终他的学位申请受到

①Carpenter, N. C. "The Study of Music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n the Renaissance (1450-1600)", *The Musical Quarterly*, 1955(41): 196.

②Anstey, H. *Munimenta Academica, Part I*. London: Longmans, Green, Reader, and Dyer, 1868, pp.285-286.

③Wood, A. *Fasti Oxonienses, the First Part*. London: R. Baldwin and Co., 1815, p.10.

④Williams, C. F. A. *A Short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Degrees in Music at Oxford and Cambridge*. London: Novello, Ewer and Co., 1893, p. 27.

⑤Wood, A. *Fasti Oxonienses, the First Part*. London: R. Baldwin and Co., 1815, p.42.

⑥Wood, A. *The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Volume II, Part II, Book I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96, p. 723.

阻碍,以往丰富的音乐实践经验和创作不能作为申请学位的有效助力。他不仅需要支付20便士的费用,还要专门创作一首弥撒。可见,即使有些学位申请者能力出众,甚至可能是最杰出的音乐家或某教区的高级神职人员,在申请高级音乐学位时亦难免经历重重考验<sup>①</sup>。遗憾的是,由于记录员的失职,1536至1549年的资料丢失,1549年后至伊丽莎白一世早期的记录都缺乏可信度<sup>②</sup>。自伊丽莎白一世统治起,英国音乐发展到了更高的水平,英国作曲家在意大利人的激励下,竞相创作出世界上最优秀的牧歌(Madrigal),在浓烈的竞争氛围中,音乐学位的申请变得更为严苛。牛津大学要求音乐博士学位候选人在申请博士学位前,需获得音乐学士学位且至少已满5年,同时申请者将在考核开始三天前接到按要求创作圣歌并届时进行表演的通知。约翰·谢波德(John Sheppard)这位优秀的管风琴师、唱诗班指挥和多产的作曲家,在牛津大学研究音乐近20年,同时也是莫德琳学院的教员,最终申请音乐博士学位未果,官方文件记录其最终头衔只是大学生<sup>③</sup>。值得注意的是,极个别久负盛名的音乐家不在这种规则约束的范围之内。

此外,申请者除了自身作曲能力外,还需支付高额费用来完成自中世纪传承下的那套烦琐而昂贵的学位仪式,这项规定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末期的学校章程中最终确立。牛津大学在1601—1602年章程中详细记载了向学位候选人征收的费用清单。例如,一位音乐学士在其学位授予的恩典中,需要像神学、法律和医学学位候选人一样缴纳12便士的费用,申请音乐博士学位的费用则更加昂贵<sup>④</sup>。

#### 四 音乐学位的演进特点

英国音乐学位的发展承袭自中世纪以来大学学位的演化传统,在都铎时期开始稳步发展,制度体系初现雏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 (一) 重视人文主义传统

都铎时期,英国大学的人文主义传统得以延

续和进一步强化。大学教师要传递的是一种自古以来累积的并持续争论着的学问,这种传统学问的内涵经过人文主义精神的充实变得愈发丰满。在重构人神关系和以人为中心的新时代,人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射到对内心世界和情感体验的关注,传统学问在人文主义的推动下被更多的人重新认识和接纳。随着人本意识的觉醒,音乐学位的申请在重视音乐学科相关知识和能力的同时,愈发注重学位中的人文知识以及获得学位后的最终回馈程度。毕竟获得音乐学位并非音乐教育的终点,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再次出发的起点,它最终需回归到人群当中,用深厚的人文积淀向大众传达音乐蕴含的人性,促进人情感的自然流露。据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16世纪的章程记录,学生在进行音乐训练时需同时进行文法课程的学习,以达到顺畅表达音乐内涵的目的<sup>⑤</sup>。同时,有部分获得音乐学位的学生并非师从某位音乐家,指导其音乐学习的很可能是某位数学家、文法学家或逻辑学家。可见,音乐教育中的人文传统并没有因为音乐学科的独立发展而消亡,它在都铎时期与音乐学科结合得愈发紧密,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音乐学位的内涵。

##### (二) 强调音乐实践能力

都铎早期,英国大学音乐学位授予的相关事宜及要求比较模糊,一般只在授予学位的当天才会通知候选人。但可以确定的是,不论音乐学士还是硕士都不需要考试和考察作曲能力,但候选人学习音乐的经历必须达到七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情况基本相同,对申请音乐学位候选人的能力和资质没有强制要求。例如,弗里维尔(H·Fryvill)在其他地方学习音乐五年,在剑桥大学学习音乐只有两年时间,他的学位申请轻松通过;而差不多同一时期的莱西(Lessy)甚至连学习音乐的具体时间不详也通过了学位授予<sup>⑥</sup>。这一情况到1509年开始有所改善,学习音乐的经历和时间不再是申请音乐学位的唯一条件,更多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对申请者本身能力的关注。由此,

<sup>①</sup>Williams, C. F. A. *A Short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Degrees in Music at Oxford and Cambridge*. London: Novello, Ewer and Co., 1893, p. 68.

<sup>②</sup>Harris, D. G. T. *Musical Education in Tudor Times (1485-1603)*. London: Taylor & Francis, 1939, p.126.

<sup>③</sup>Bloxham, J. R. *A Register of the Members of St. Mary Magdalen College, Oxford, Vol. II*.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57, p.187.

<sup>④</sup>Gibson, S. *Statuta Antiqua Universitatis Oxoniensis*.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31, p.467.

<sup>⑤</sup>University of Oxford. *Statutes of Corpus Christi College, Oxford*. Oxford: J. H. Parker, 1853, pp.37-38.

<sup>⑥</sup>Williams, C. F. A. *A Short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Degrees in Music at Oxford and Cambridge*. London: Novello, Ewer and Co., 1893, p. 18.

对实践经验和能力的强调,成为英国都铎时期音乐学位有别于早期发展的突出特点,并逐渐演变为英国音乐学位申请的普遍要求。据记载,约翰·文顿(John Wendon)是牛津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在申请音乐学位时被要求创作一首弥撒,并在表演中演唱的学位候选人,这是申请音乐学位时对音乐实践能力要求的最早记载<sup>①</sup>。1515至1516年,申请音乐学位时对作曲等实践能力的详细要求不只局限于创作宗教弥撒作品,世俗歌曲的创作亦涵盖在内,这种带有附加条件获得音乐学位的模式使申请的难度进一步提升。

至1519年时,剑桥大学也开始增加音乐学位的实践要求,学位申请条件变得灵活多变,不仅在个人能力考察中增加了多种形式的作曲要求,而且实践考核也变得更加多样,申请者必须面对日益严峻的能力考验。有些申请者除了被要求创作传统的弥撒外,还需创作轮流对唱的赞美诗。音乐创作形式的丰富也使得申请者可以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灵活地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克里斯托弗·泰尔(Christopher Tye)在申请其音乐学士学位时,作曲只是基本要求,而表演环节则有多种选择。他可以在会议后简短地演唱,亦可选择在

公众集会的重大时刻进行表演,但至少要在重要的场合显示出他学识的渊博<sup>②</sup>。拓宽音乐实践能力的考察实际上也是对申请者能力的变相考验,通过观察他们在特定时刻的临场发挥,能更有效地窥见音乐学位申请者的真实能力。

### 结语

纵览都铎时期英国音乐学位的发展,它经历了从侧重音乐理论至强调申请人音乐实践能力的演进,作曲能力很快成为评判音乐学位申请者能力的主要依据,英国音乐学位的发展在摸索中前进并逐步成型。虽然从整体上看,早期英国大学音乐学位的发展思路不甚清晰,也没有相应完善的制度保障,但不可否认的是,人文精神与宗教改革极大地推动了音乐学位的时代演变。从都铎时期教育的宏观视角和完整序列来看,音乐学位的发展只是英国高等教育在这一阶段发展的缩影,但其作为大学音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都铎时期大学教育演进中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为近代大学音乐学位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最早的范本。

## From Honorary Degree to Competency: The Evolution of Music Degree in Tudor Dynasty of England

ZHOU Yi-bin & YI Hong-jun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Tudor period was an important node in the transition of education and university change in England. Under the dual influence of humanism and religious reform, the construction of music degree in traditional England universities had undergone an important change. From the early stage, it was the highest honor to recognize outstanding musicians and music talents who had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and later focused on individual practical ability and formulated regulations of awarding a degree in music. Its evolution reflects not only the importance of the universities' emphasis on the fine tradition of music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usic education, but also the new trend of music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modern universities in England.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music degree in early England has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evolution and gradual improvement of the university music degree system in modern time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Key words:** England; Tudor Dynasty; university reform; music degree

(责任校对 王小飞)

<sup>①</sup>Boase, C. W. *Register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Vol. I*.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885, p.65.

<sup>②</sup>Williams, C. F. A. *A Short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Degrees in Music at Oxford and Cambridge*. London: Novello, Ewer and Co., 1893, p.19.

# 《城市人民公社研究资料选编》套书评介

姚二涛,吴怀友

《城市人民公社研究资料选编》(8卷本,下称《选编》)于2020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一件大喜事,不但对城市人民公社研究者是福音,而且对推动“社会主义发展史”等“四史”的研究,也意义重大。之所以如此,是由《选编》之资料构成、特点及学术价值所致。

## 一

《选编》由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城市人民公社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课题成果《城市人民公社文献选编》(12卷本)与《城市人民公社运动再研究》(专题论文集)的部分篇章组成。编入本书的文献共572篇。就其来源而言,由三类研究资料构成。

第一类:城市人民公社专题研究论文15篇。其中作者自著11篇,作者指导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论文4篇。这些专题论文都是国家社科重点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或后续研究成果。按文章发表时间的先后次序,编入第1卷:《城市人民公社运动再研究》。为什么叫“再研究”?显然是《城市人民公社运动研究》的延伸与拓展,回答以往研究中未曾论及又亟须解决的问题。

第二类:授权档案资料264篇,编入第2至5卷:《城市人民公社档案资料》(甲)(乙)(丙)(丁)。这些档案资料的制作人上至中央及各部委,下至城市人民公社。它们分别出自上海市、湖南省、陕西省、福建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河南省、沈阳市、哈尔滨市、合肥市、南昌市、南京市、福州市、银川市、南宁市、长沙市、湘潭市、株洲市、长沙市岳麓区、湘潭市雨湖区等档案馆,并经其授权出版。编入《选编》的文献只是重点课题结项成果的一部分,还有许多城市公社档案文献未能入选,这固然遗憾,但并不妨碍其整体效果。

第三类:报刊资料293篇,编入第6至8卷:《城市人民公社报刊资料》(甲)(乙)(丙)。刊登城市人民公社信息的报刊种类繁多,包括《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大公报》《文汇报》《北京日报》《新华半月刊》《财经研究》《中国经济研究》《教学与研究》《人民音乐》《人民公社好》等报刊

近40种。刊登城市人民公社信息的时间从1958年8月至1962年4月。它们都记录了城市人民公社从试办到大办,从兴旺到衰落,直至解体的历史过程。就内容而言,传播的是时政要闻、政策导向、经验之谈、学术热点、好人好事、风土人情等。

## 二

《选编》是“编著一体,史论结合”的大型学术著作。大致说来,有如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史料丰富且原始。辑入本书的史料557篇(不含研究成果),约300万字。文献制作者上至中央及各部委,下至公社,级级都有,层层反映。中央及各部委文献记载各个时段关于城市人民公社的方针与政策,在城市人民公社运动中起指导与引领作用。而各个地方文献的出台,也都是贯彻上级指示的产物,反映了中央与地方热烈而真实的互动。从内容上看,包括城市人民公社涉及的方方面面,比如“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社办工业、集体生活、公共服务事业、妇女解放、工资分配、财务管理等。文献资料的种类上,包括档案资料与报刊资料两大类。档案文献属首度问世,是典型的原始资料,原始性是它的本质属性。即使是报刊上已经公开过的文献资料,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只有少数被利用过,绝大多数的报刊资料在文献利用功能上依然保持了“一次文献”的原始性质。

第二,史料代表性强且珍贵。文献资料涉及地域除中央机关外,还包括当时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其中中央及部委机关关于城市人民公社的文献源自几十家各级国家档案馆。这些“东拼西凑”起来的文献资料,一旦集合到一起,不仅能完整、系统地勾勒出城市人民公社的历史进程,而且能够全面、深刻领悟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中央寄予城市人民公社这一基层政权组织的初衷与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是史学研究中长期被诟病的纯“政治文本”,或“官方文献”,但在城市人民公社研究领域,依然称得上是“至尊宝典”。

第三,“整理与研究”并重且新(下转封三)

(上接封二)意迭出。已故党史大家张静如先生曾说:“重大史料的出现从而改写历史,是历史研究的常态。”对城市人民公社历史研究何尝不是如此?大量原始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对于昔日备受“冷落”的城市人民公社历史脉络的梳理与各个问题的探讨研究,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支撑。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管是专著还是专题学术论文均给人以别开生面、原创或“填补空白”之印象。大量原始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有助于认识城市人民公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助于从某一点或某一方面对既有成就提出挑战、新见解和新思想。正是凭借扎实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坚持“整理与研究”并重,在研究中提出了不少有创见的新思想和新观点。譬如,指出《现代汉语词典》对“人民公社”定义之误,澄清了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插曲”、城市人民公社“大多有名无实”“只办了点服务性事业”等偏颇性观点。对城市人民公社起落脉络的梳理、影响与作用的评价,不仅体现了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实践价值,而且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果。

### 三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源泉,资料整理出版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工程。《选编》不只是挖掘、整理、保护与传承了党的历史文献,更有价值的是,全面且翔实的文献资料的问世,将揭开城市人民公社史学研究新的一页,无论是对于拓展城乡人民公社史、城乡社会变迁史研究,还是深化中共党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均有着重要意义。尤其是《选编》用一种特殊且原生态的方式将“波澜壮阔”的城市人民公社历史场景展现在世人面前,分享其所蕴含的“社会主义发展史”等的宝贵精神财富。其中最主要的包括:

(一)城市人民公社历史证明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始于毛,成于邓”。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集体创造了一系列独创性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城市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城市基层的载体,是共产主义理想模式在中国城市社会的最初尝试。不论其成败如何,都为当代

中国城市社会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所以说,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始于毛,成于邓”。

(二)城市人民公社历史彰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智慧与探索。在城市中建立人民公社是一次生产关系大变革,完成了城市基层治理由“街居制”向“单位制”的历史性转变,最大贡献在于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街道居民委员会一级,确立了党对城市底层社会的全面领导和掌控,结束了在此之前城市社区“一盘散沙”的历史。这对当下改革创新城市社区治理体制及治理方式提供了有益启示,对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

(三)城市人民公社实践积累丰富了党走“群众路线”的宝贵经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重要法宝。无论是城市的人民公社化,还是在城市人民公社运动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都离不开城市群众的激情参与与大力支持。比如,城市人民公社在全国所有城镇(大陆,除西藏)的基本普及,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期间,城市居民参与的人数之多、成分之广泛、激情度之高,在新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绝无仅有。另外,对付三年经济困难也同样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의深切理解与密切配合。那个时候,城市粮食很紧张。包括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存粮最短只有几天。就在这么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候,中共中央做出了决策,要精简城市人口,把城市公社里的部分社员动员还乡,回到农村。中央一声令下,为了国家的利益,2000万群众积极响应,很快就完成了这个任务。群众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和贡献,才促使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度过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总之,毛泽东及当时的党中央领导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早期探索中既留下了成功的经验,也留下了失误的教训,这两方面都为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与重要启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

基金项目:2019年度湖南省党建理论基地重点项目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